

倭仁手札三通

周新凤

倭仁（1804—1871），乌齐格里氏，字良峰。蒙古正红旗人，河南开封驻防。道光九年（1829）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十二年授编修。道光二十四年任大理寺卿。咸丰五年（1855）任侍讲学士。咸丰六年擢盛京礼部侍郎。同治元年（1862）正月，擢工部尚书；二月，著授皇帝读；八月，授文渊阁大学士。同治十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卒谥文端。有《倭文端公遗书》传世。

河南省图书馆藏有《李鸿章等书信》^①一册，收李鸿章、曾国荃、倭仁、李瀚章、彭玉麟、倭仁、沈葆桢等34位晚清朝臣的手札约60通，其中李鸿章、曾国荃、李瀚章三人的手札已由笔者整理并刊出^②。中收倭仁的三通手札，有两通是表示祝贺的，用红色信笺书写，另一通则表示吊唁，用灰褐色信笺。查《倭文端公遗书》^③以及以《倭文端公遗书》为底本的《倭仁集注》^④等，这三通手札均未见收录，现对其文字予以释读并对信函的时间、接收人等进行探究，希望有助于倭仁的研究。

一（图见封二）

云轩仁兄大人：

久疏音候，殊切怀思。昨阅邸抄，欣悉荣补名区，曷胜欢忭。辰惟福履增绥，新猷丕焕，庆釐閏之日永，知棠舍之风清，引企黄堂，良深心颂。弟公私历碌虚掷，居诸无可为知己告。舍弟解餉入都，不无赔累，然天伦藉此一聚，殊觉畅然，昨于月之十三出京矣。家本生慈叨赖

①《李鸿章等书信》之题名，为河南省图书馆古籍善本登录簿中的书名。

②《文献》2007年第1期。

③清光绪元年六安求我斋刻本。

④（清）倭仁著，张凌霄校注：《倭仁集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

安康，舍下一切粗适，堪慰垂廬。专此布贺大喜，敬请升安，诸惟亮察，不宣。愚弟倭仁顿首。

贤侄輩读书必更长进，念念。

再启者：兹有敝同年刘鹤洲二兄郑州副贡名文娘，夙仰德辉，道经贵治，属弟一言以为介绍。敢求仁兄大人关情梓谊，或教读或书院，推荐一席，俾寒士得有安研之所，则感侔身受矣。弟仁拜恩。

按：信札中提到“家本生慈叨赖安康”，说明倭仁的生母尚在人世，据《清代七百名人传》^①、《清史列传》^②等书记载，倭仁曾于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丁忧。可以推出该函写于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之前。

由于信札中有“关情梓谊”一句，可以初步判断“云轩”应是河南人。在《中州名典》一书的“名臣”类目下，有对“张光第”的介绍，说他“字镜春，号云轩，祥符（今开封）人”^③。[光绪]《祥符县志》^④、[同治]《畿辅通志》^⑤和[光绪]《重修安徽通志》^⑥记载，张光第于道光五年（1825）举乡试，以修贡院之功，授莆田县知县。道光十八年任河北顺德府知府。二十六年任河北广平府知府。咸丰三年（1853），擢安徽按察使。张光第号“云轩”，又是河南祥符人，且与倭仁同时，所以可以认定其为手札的接收人。

根据张光第的履历，结合手札中提到的“引企黄堂”一句，还可以进一步判断这通手札应该是写于道光十八年或二十六年，亦即张光第任顺德府知府或广平府知府的时候。“黄堂”，乃知府的俗称。“引企黄堂”，说明张光第“荣补名区”，是就任知府之职。其时，倭仁在京城供职，母亲与其一起居住，其弟“解饷入都”，一家人得以团聚，享受天伦。倭仁在手札中向张光第推荐自己的同年刘鹤洲即刘文娘，希望他能为他谋得教读或书院的职位，使其能够安身立命。在民国《郑县志》^⑦卷9“选举志”之“副贡”下的“道光辛巳科”里，有“刘文娘”，为“郑州副贡”。

①《清代七百名人传》（上），中国书店，1984年，第350—351页。

②《清史列传》第12册，第3631页。

③《中州名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75页。

④（清）沈传义修，黄舒昊纂，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⑤（清）李鸿章修，黄彭年纂，清光绪十年刊本。

⑥（清）沈葆桢修，何绍基、杨沂孙纂，光绪四年刊本。

⑦周秉彝修，刘瑞麟纂，民国五年刊本。

二

云轩仁兄大人苦次：

接奉讣函，惊悉老伯母大人于六月廿八日锦堂弃养，展诵之馀，曷胜骇悼。前岁奉先本生慈讳，友人云，今日士大夫居丧，不患不节哀，只患不哀。此对弟凉薄之人言之耳。仁兄至性敦笃，遭此大变，自必哀毁逾恒。惟念灵輶未返，窀穸未安，经营一切，诸费心神，尚望于哀痛迫切之时，存撙节爱养之意，此则区区之心所切祷于万里外者也。弟职守攸属，不克执绋从事，稍尽子侄之谊，谨具挽幛一悬，伏祈鉴存是幸。专此布唁，敬请礼安，不具。愚弟倭仁顿首。

附启者：弟于正月廿日挈眷出都，七月初三抵叶^①视事。刻下边卡静谧，眷口粗安，堪纾垂注。弟倭仁再顿。

按：从这通手札后“附启者”中提到的事件和时间，可以较容易判断出它写于咸丰元年（1851）七月之后。咸丰皇帝即位之初^②，为振济朝纲，诏谕内外官员上书陈言，献计献策。倭仁便上了《应诏陈言疏》，以理学家的口气阐述自己的治国之论。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倭仁被赏副都统衔，充新疆叶尔羌帮办大臣。他于咸丰元年正月二十日挈眷离京，七月初三日到达新疆叶尔羌。倭仁将自己赴任途中所见所闻记入《莎车行纪》中。这通手札中所提及的时间、行程无疑是对这段经历的简述。倭仁充新疆叶尔羌帮办大臣，是远戍，一直被认为具有贬谪的意味，是倭仁仕途生涯中的一个低谷。

倭仁在“咸丰元年”所称的“前岁”，当为道光二十九年，即1849年。“前岁奉先本生慈讳”一句，说明在道光二十九年时，倭仁的生母去世。从事件、时间的吻合上，我们可以推出，倭仁在道光二十九年的“丁忧”是丁母忧。

三

南卿四兄大人阁下：

送别荣旌，阶蓂屡易，正深葭溯。顷奉兰章，就谂吉座鼎升，新猷丕焕；引詹矞采，良愜颂私。弟夏间抱恙三月有馀，本拟奉身而退，以避贤路。复承恩命，俾侍讲筵。极知德薄才疏，于圣学无补，惟受国厚恩，自当勉图报称耳。销假后壹是如常，堪纾垂系。专此布贺任喜，祇请升安，顺完谦柬不备。愚弟倭仁顿首。

①叶：指新疆叶尔羌。

②咸丰皇帝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即位。

按：函中称：“弟夏间抱恙三月有余，本拟奉身而退，以避贤路。复承恩命，俾侍讲筵。”参考倭仁的传记资料，可以推知此函写于同治六年即1867年。《清史稿·倭仁传》记载，同治“六年，同文馆议考选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馆肄习天文算学，聘西人为教习。倭仁谓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尤以西人教习为不可；且谓必习天文算学，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上疏请罢议。于是诏倭仁保荐，别设一馆，即由倭仁督率讲求。复奏，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寻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倭仁屡疏恳辞，不允。因称疾笃，乞休，命解兼职，仍在弘德殿行走。”^①同治六年，倭仁在执意反对同文馆增开天文算学馆、聘西人为教习且招考科甲正途官员的过程中，自己却被朝廷和恭亲王奕忻等逼到了极为尴尬的境地：他既没有能力遵照谕旨，去保荐精于天文算学之人，又要被强迫“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在重重压力之下，倭仁“屡疏恳辞”，“因称疾笃，乞休”，这可对应手札中所言的“拟奉身而退”之意；而“命解兼职，仍在弘德殿行走”，则又可对应手札中的“复承恩命，俾侍讲筵”之句。

《清史稿》卷二十一穆宗本纪记载，同治元年二月二日（1862年3月2日），两宫皇太后“懿旨，皇帝在弘德殿入学读书”^②。又命倭仁与祁寯藻、翁心存等在弘德殿授皇帝读，成为同治皇帝的汉文师傅。同治六年六月十二日（1867年7月13日），由于同文馆算学馆之争，倭仁在病中再次请求开缺^③，而同治皇帝谕曰：“倭仁不必给假，一俟气体可支，即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其馀一切差使，均著勿庸管理”^④。

与倭仁同为帝师的翁同龢^⑤，在其日记中也记载了倭仁的这次生病经过。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起，倭仁由于眩晕而告假，之后又续假，又两次请开缺，直至七月初三日才销假^⑥。对此事件，《清史列传》在倭仁的传记中也有记载：“四月，因病请假一个月。五月，奏病难速愈，请开缺调理，得旨，再赏假一个月，毋庸开缺。六月，复请开缺。”^⑦“七月，病痊”^⑧。这

①《清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二十五史》版，1986年，第10122页。

②《清史稿》，第8909页。

③此前之五月十二日，“倭相请开缺，旨赏假一月安心调理。”见《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538页。

④《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实录》（七），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第4671—4672页。

⑤翁同龢于同治四年成为帝师。《翁同龢日记》记载，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是日臣龢蒙恩命在弘德殿行走。”见《翁同龢日记》，第431页。

⑥《翁同龢日记》，第530页、532页、538页、544页、548页。

⑦⑧《清史列传》第12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3639页。

两种文献的记载，均能与手札中提到的“夏间抱恙三月有余”相吻合。

据此可推断手札的写作时间是同治六年。由于手札中还有“销假后壹是如常”之辞，又可推定它是写于七月初倭仁销假之后了。

这通手札的接收者“南卿”应是刘毓楠。^① [光绪]《祥符县志》^①卷 17 “人物志”之“列仕”记，刘毓楠“字南卿，祥符人。道光己酉科副贡，咸丰辛亥举于乡，壬子成进士。由礼部主事历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同治五年转礼科掌印给事中。补授安徽凤颍六泗道，署理按察使。旋被议，以原品休致。光绪三年在籍办理赈务，赏加按察使衔。毓楠在谏垣章凡数十上，人服其伟议。”《清史稿》在张之万、张曜等人的传记^②中，均提到了身为御史的刘毓楠在同治年间上章弹劾官员之事。

倭仁曾驻防河南，与刘毓楠算得上是同乡，又是同朝为官^③，他们之间的交往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对于倭仁而言，同治六年是其仕途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将这通手札放在历史上著名的同文馆事件的大背景之下，也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它，可以了解倭仁在同文馆事件之后的心态。

倭仁是清代道光、同治间一位理学大家，他身为帝师，言行严谨，他反对设立同文馆，又被学者称为“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④，但从这些手札中，则可以看到一位既重亲情、又重乡情和友情的倭仁。

倭仁出生于河南，在考中进士之前，也主要生活在河南。这使其在以后的仕途生涯当中，与河南籍的官员和友人保持着较多来往。倭仁的这三通手札，应该是他们之间往来的二、三例证。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省图书馆

①清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②分别见《清史稿》第 10202 页、第 10229 页。

③同治二年（1863）十月，倭仁等人曾借御史刘毓楠奏请崇尚节俭屏绝浮华之机，以皇上“释服逾期”，联衔上了《杜渐防微疏》。见李细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典型——倭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143 页。

④参李细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典型——倭仁研究》。

倭仁致云軒函(文見90—91頁)

雲軒仁兄大人久昧音候殊切懷思昨聞邸抄欣悉

榮補名區曷勝懽仰辰維

福履增綏

新猷丕煥慶

謾聞之日永知

棠舍之風清引企

黃堂良深心頌弟公私厯碌空擲居諸無可為

知已告舍弟解餉入都不無賠累然天倫藉此一聚
殊覺暢然昨于月之十三出京矣家本生慈叨賴
安康金下一切相適堪慰

垂廬專此布賀

大喜敬請

亮譽不宣

賢姪輩讀書之更長進

愚弟倭仁頓首

子靜仁兄大人閣下前駕煙臺寓書疏報
與否計嘗發蒼

雅鑒以想而表

福躬承祐

効厥龐宏引咎

付電奉候周易於正月廿一日隨同

西欽案使節招津次日署謁

侍郎陳誥假歸口里該書幸親作退思一計

如意堅苦不許僅乎假百仍復趣今比未將夫
身後慨百言吊約此亟至候旅里凌時時計謫
未討預乞大知勞

席矣端此世間虛辟幸安其移

勑多特惟

四坐不宣

如弟袁景凱頓首

中和弟

袁世凱致潘志俊函(文見98—99頁)